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分配一体化理论述评

陈广汉

7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家越来越认识到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应该成为经济发展追求的两个重要目标,收入分配应该成为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和评价发展成就的一个标准。以哈罗德—多马模式为基础的宏观计划模式仅仅把重心放在经济增长上,不能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的状况。因而,需要建立一种模式对不同群体的收入与经济增长的决定提供一种一体化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思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Chenery)和阿路瓦利亚(M·S·Ahluwalia)提出了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的分析结构和理论模式。它是世界银行组织的规模庞大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研究的一项成果。

一、增长与分配目标相结合的社会福利标准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收入分配的目标不能被看成是独立于增长目标的。相反,应该根据不同社会经济群体满意的收入增长率对它们进行动态地表述。”^①为此,他们提出了把增长与分配目标相结合的福利标准。

他们根据人们的资产、收入水平和经济职能将社会成员分成若干个社会经济群体,每个群体收入增长率被用来衡量该群体在某一特定时期社会福利的增长,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率就可以定义为所有群体收入增长的加权总和。假定以收入为标准,依收入水平从高到低排列,将社会分成五个群体,那么总的社会福利增长指标G可表示为:

$$G = W_1g_1 + W_2g_2 + W_3g_3 + W_4g_4 + W_5g_5$$

g为各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率,W是为相应的社会经济群体的收入增长所设计的权数。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福利权数 W_1, \dots, W_5 。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加权方法:

1、GNP权数。GNP的增长速度是衡量经济成就的一个最通用的指标。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GNP指标只是上式中的一种特例,即:每个社会经济群体收入增长的权数刚好等于他们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时的一种情形。在各个群体的收入份额差别很大的情况下,GNP权数不可能用来作出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增长的福利判断。

2、平均权数。它是通过总人口而不是总收入的比例来对每一群体的收入增长进行加权处理,平均权数等于每个群体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如果把社会的总人口分成五分,那么平均权数就是0.2。

3、贫困权数。如果政府主要以穷人群体的收入增长为社会目标,就可以使用贫困权数,对穷人的收入增长规定较高的权数,而对富人收入的增长给予较低的权数。

因此,他们认为这种社会福利指标和加权方法可以根据收入增长的分配型式,而不只是根据GNP的增长来确定发展的目标、调节发展的进程、检查发展的成就。“一般来说,增长的加权指数偏离GNP增长率的程度和方向,可以衡量增长的分配偏向的程度和方向。”^②收入分

配不均等的改进可以通过加权的增长率超过GNP的增长率的程度来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等的扩大则可以通过加权增长率低于GNP的增长率的程度来衡量。它的特点在于克服了传统GNP指标的不足,把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目标结合起来,并把重点放在贫困群体收入增长动态过程上,而不是相对收入不均等的静态图像上。

二、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综合的模式

社会福利标准只是提供了使增长目标和分配目标结合的一种方法,它并没有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同时这种福利标准在实际运用中也需要有可操作的计划模式。这种模式要能反映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上的特点,并能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决定给予统一的论述。钱纳里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低收入者和穷人主要集中小规模的非正规部门,他们处于工资经济之外;第二,在收入集中的底下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更高层次的集中。这决定了他们模式的建构和政策的选择。

1. 模式的基本结构。它由生产决定和分配决定的两套方程式构成。根据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及获得生产性资产的差别把社会分成三个群体:富人、中等收入者和穷人,他们分别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0%,40%,40%。资本主要分成两类:产生收入联系的资本(K^L)和不产生收入联系的资本(K^N)。当一个经济群体所占有的物质资本生产的产出中,有一部分以工资形式流入其它收入群体时,这种资本并产生了收入联系。否则,并没有产生收入联系。钱纳里认为:“一个群体的收入增长同另一个群体的收入增长之间这种相互依赖,是增长和分配一体化理论的核心。”^⑩人力资本存量反映在工资水平上,每个群体的收入由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构成。模式包括了以下基本变量:

Y_1 、 Y_2 、 Y_3 、 Y 分别为富人(群体1)、中等收入群体(群体2)、穷人(群体3)的收入和总收入。

W_1 、 W_2 、 W_3 分别为三个群体所获得的工资收入。

C_1 、 C_2 、 C_3 、 C 分别为三个收入群体的消费与总消费。

P_1 、 P_2 、 P_3 分别为三个群体所获得的非工资收入。

K_1^L 是富人所有的用于雇佣其它群体的劳动的资本,它产生收入联系。

K_1^N 是富人所有的,只用于雇佣本群体的成员(例如,雇佣高技能的劳动力,而这种劳动力只在富人中)或投资国外的资本,它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没有关系。

K_2^L 是中等收入群体占有的资本,用来雇佣劳动力,产生了收入联系。

K_3^N 是穷人所有的,自我雇佣的资本,对其它群体不产生收入联系。

Q_j^i 是来自于与i和j相一致的资本存量的产出。

(1) 生产决定公式。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根据上述四种资本,得出如下产出等式:

$$Q_1^L = a_1 K_1^L \quad (1a) \quad Q_1^N = b_1 K_1^N \quad (1b)$$

$$Q_2^L = a_2 K_2^L \quad (1c) \quad Q_3^N = b_2 K_3^N \quad (1d)$$

Q 分别表示三个经济群体来自于不同资本的产出,它的右下方的标号1、2、3分别代表富人,中

等收入者、穷人三个收入群体,右上方的标号L和n分别表示来自于产生收入联系和不产生收入联系的资本的产出。 a_1, a_2 和 b_1, b_2 分别代表相应资本的产出一资本比率。社会总产出等于三个群体的产出之和,而每一群体产出的增长又取决于他们所占有的资本存量和该资本的生产率。

(2)收入分配决定公式。每种资本存量的产出都在工资与非工资收入形式之间分配。一定时期,某一群体的总工资收入(W_i)可分别表示为:

$$W_1 = W_{11}Q_1^L \quad (2a) \quad W_2 = W_{21}Q_1^L + W_{22}Q_2^L \quad (2b)$$

$$W_3 = W_{31}Q_1^L + W_{32}Q_2^L \quad (2c)$$

W_{ij} 代表工资参数,是第*i*收入群体从生产 Q_j^L 中所得到的工资份额。三个收入群体的总的非工资收入也可以分别表示为:

$$P_1 = P_1Q_1^L + Q_1^n \quad (3a) \quad P_2 = P_2Q_2^L \quad (3b)$$

$$P_3 = Q_3^n \quad (3c)$$

P_i 是非工资收入在相应产出中所占的份额。

三个群体的总收入等于各自的工资收入与非工资收入之和,它们分别表示为:

$$Y_1 = W_1 + P_1 = W_{11}Q_1^L + P_1Q_1^L + Q_1^n \quad (4a)$$

$$Y_2 = W_2 + P_2 = W_{21}Q_1^L + W_{22}Q_2^L + P_2Q_2^L \quad (4b)$$

$$Y_3 = W_3 + P_3 = W_{31}Q_1^L + W_{32}Q_2^L + Q_3^n \quad (4c)$$

从公式(4a)一(4c)中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被分解为不同社会经济群体收入的增长。将(1a)一(1d)公式中 Q_j^L 分别代入(4a)一(4c),并可十分清楚地看到每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分配、工资参数和生产率参数,其中资本存量是决定性的。因此,增长和分配理论的综合来自于资本积累(包括人力和物质资本)的双重作用。在模式中,“各种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决定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收入群体之间分配的模式。”^④资本存量的增长率成为联系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桥梁。

2、模式的动态化。它主要来自于各种资本存量的增长即资本积累。人口增长和生产率的变化也是影响分配与增长的动态因素。

(1)储蓄与资本积累率。储蓄率直接决定着资本的积累率,而资本积累的速度与构成也决定着经济的增长与收入的分配。假定储蓄都可以转化为投资,每个群体的储蓄只在本群体内投资,那么各种类型的资本的增长可以表示为:

$$\Delta K_1^L = qS_1Y_1 \quad \Delta K_1^n = (1-q)S_1Y_1$$

$$\Delta K_2^L = S_2Y_2 \quad \Delta K_3^n = S_3Y_3$$

q 和 $(1-q)$ 是富人将他们的储蓄在 K_1^L 和 K_2^L 之间分配的比例。 S 代表储蓄率。由于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假定储蓄率是收入的函数,那么 $S_1 > S_2 > S_3$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差别扩大。

(2)人口增长。在他们的模式中,每个社会经济群体的人口是以一个外生的、特定的

增长率变动的。因而，人口增长公式也有三个：

$$N_{1t} = N_{10} (1 + n_1)^t \quad N_{2t} = N_{20} (1 + n_2)^t \quad N_{3t} = N_{30} (1 + n_3)^t$$

N表示人口数量，在N右下方的标号“O”为某一群体在被研究的那一时期开始年份的人口数量，标号“t”为第t年的人口数量。n为人口的增长率，由于人口的增长率同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成反方向变化，因此 $n_1 < n_2 < n_3$ 。

他们认为，人口的增长是通过储蓄率的影响，来作用经济增长和分配型式。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会使人均收入下降，从而降低储蓄水平。在穷人的口增长率大于富人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也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

(3) 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性质会影响模式中增长与分配的结果。钱纳里认为，一般来讲，任何一种资本的生产率提高都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取决于那个群体占有这种资本，以及其它社会经济群体如何通过工资流同它发生联系。而由于劳动者生活条件的普遍改善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会提高雇佣劳动的那些部门的资本的产出一资本比率，如果工资参数不变，所有的群体都会从中获利。

以上是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模式的基本结构。它实际上给出了三个具有不同资本存量、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的哈罗德—多马式经济，通过工资收入的向下流动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所产生的向上的作用力把它们联系起来。模式包含的增长理论是以熟悉的哈罗德—多马模式为基础，资本积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模式中的分配理论则反映了钱纳里等人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原因的基本看法，即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高度集中决定了收入分配的高度集中。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增长与分配理论一体化的模式。他们强调指出“认识资产分配在解释个人收入配分中的作用对发展战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策应该努力改变整个时期物质和人力资本集中的基本型式”。^⑤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战略与政策的选择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模式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出，在增长与分配目标基本协调的情况下，以加速发展中国家40%的穷人的收入增长为目标的各种政策的选择范围。政府主要通过财政政策使收入和资源从富人转向穷人，以改变物质和人力资本集中的状况。他们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种方法：现有资产的静态再分配和以改变整个时期资本积累构成的资产动态再分配。他们选择了后者，把公共投资的再配量作为改变资产集中状况和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政策，并通过模式对三种主要的收入分配战略和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模拟和评价，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这一政策主张。

1. 消费转移政策。他们模拟了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中，将2%或3%的总收入转移给穷人，直接提高穷人的消费水平，所引起的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变化。为了说明转移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他们假定转移的收入完全来自富人的储蓄，穷人将得到的收入只用于消费不用于生产。在开始一段时期内，穷人的人均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由于资本的生产率被假定是穷人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函数，因而这也会使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但是，由于这种转移是以减少富人的积累为代价的，这不仅会使富人的收入增长降低，而且通过收入联系，使中等收入者和穷人群体的收入也下降。在他们模拟研究的时期内，由于收入的增长率降低，富人和中等收入群体的地位下降。穷人群体虽然在开始一段时期生活得到改善，但当转移停止时，他们的人均消费水平很快降到他们的人均收入所能维持的水平。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这种政策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最终并没有使收入分配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

2. 投资再分配政策。政府将所调动的资源不是直接用于穷人的消费,而是进行投资,增加穷人的资本,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以达到提高该群体收入水平的目的。这些投资包括提供信贷,物质投入,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穷人所占有的资本的劳动生产率的投资。这些投资直接增加了穷人所占有的资本,它们所增加的产出完全归穷人所有。投资转移政策与消费转移政策相比,尽管开始时,穷人的消费水平提高比较慢,但它可以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下去。当转移停止时,穷人所占有的资本存量增加,他们的生产能力提高了,所以收入仍能不断增加。这种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这种收入转移所形成的资本的生产效率。

3 工资限制。它是经济增长战略的一种极端形式,通过工资限制将收入集中在储蓄倾向较高的富人手里,以加快资本的形成。这种思路比较符合刘易斯的理论和巴西60年代的发展经历。钱纳里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政策收入差别的严重扩大,这种政策的提出者高估了经济增长利益从上向下的“滴流”效应。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投资转移政策等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资本积累,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改变经济中资本高度集中状况,从而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分配的差别。同时,他们认为收入分配的各种战略和政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需要配套进行。

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的理论和政策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方法和理论上的结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他们把经济增长分解成几个部门,探讨同时决定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因素,从一套假设出发,建立起模式,然后模拟增长与分配的进程,并对收入分配的各种战略和政策进行评估。在理论上,他们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刚性、部门之间的结构差异和不同经济群体的经济行为的特殊性。例如:生产的二元性质;社会、地理和教育引起的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不同社会群体的储蓄行为和人口增长率的差别等等都是他们的理论建立的基本前提。总之,在他们眼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一个分割的经济,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同质的和无差别的新古典的世界。

第二,政策和战略上的改良主义。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认为以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来换取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主张发展中国家对发展战略实行重新定向,把收入分配看作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他们把物质和人力资本的高度集中作为收入分配不均等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并不主张对现有的高度集中的资产进行再分配,而是通过投资转移,实行所谓资产动态再分配,自称是“伴随增长的收入再分配”战略。因此,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改良主义”的模式。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渐渐的投资转移政策是不够的。他们还低估了实行资产动态再分配时,可能遇到的政治阻力。

但是,钱纳里和阿路瓦利亚的理论有两点可取之处:第一,强调资产所有权在决定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在政策上主张不应该只是“输血”,而应该增强收入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加他们永久摆脱贫困的能力。在研究方法上,他们从60年代一些学者主要围绕库兹涅茨倒U假说,分析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转向结合具体国家的情况,探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相结合的理论政策,这也是一个进步。

注释:

①②③④⑤钱纳里等:《伴随增长的再分配》,牛津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第38、41、210、211、44页。

(责任编辑 程镇岳)